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Studies on scientific
social management

社会管理科学化
与文化发展繁荣
研究

and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史昭乐 ◎ 主 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主编：王一川

— 100 —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社会管理科学化与 文化发展繁荣研究

史昭乐 主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管理科学化与文化发展繁荣研究 / 史昭乐主编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81126 - 468 - 5

I. ①社… II. ①史… III. ①社会管理 - 中国 - 文集
②文化发展 - 中国 - 文集 IV. ①D63 - 53②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377 号

社会管理科学化与文化发展繁荣研究

主 编： 史昭乐

责任编辑： 张 一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兴顺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6 - 468 - 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 话:(0851)6613237

鸣谢：
本书出版得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资助

编者的话

2011年里,先后有两个重大的实践课题正式列入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上半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要求;下半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诚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是若干学科都应关注和研究的,但更与社会学的固有研究领域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因而自觉开展这两大课题的研究更是社会学界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有鉴于此,贵州省社会学学会在广大会员积极投入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决定将上述两大命题作为2011年的学术年会主题,并于11月27日与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召开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与贵州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各会员单位认真动员,众多会员踊跃投稿,参会代表达200余人,共收到电子版稿件158篇,可谓群贤汇至,百花竞放。

会议收到的100多篇论文,既反映了我省社会学学会会员们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注与投入,又反映了一年来会员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反映了会员们在科研实力与科研水平上的新提升。

由于“内存”所限,在选编论文集时颇感为难。好文章不少,却只能入选50篇左右,以便不超过40万字的成书规模。于是确定了几条遴选原则:一是扣主题较紧,二是文章写得较好,三是安排过大会发言,四是适当统筹各单位、各方面代表的比例。经过编辑组的认真挑选,并通过与学会及有关单位领导的沟通协商,才最后确定入选文章。显然,这几条原则综合应用的结果,也就决定了并非好文章都能入选。这是编者想要说明,想必也是大家可

以理解的。

本文集按论文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社会管理编”,第二板块是“文化发展编”,这两大板块所含文章分别论及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文化发展的诸多方面。其中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有实践层面的研究;既有全国性视角,更有贵州省聚焦。第三板块则是“社会管理科学化与文化发展繁荣编”,文章分别从多层面、多维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这次研讨会受到贵州省社科院的高度重视。院长、二级教授吴大华博士亲临会议,发表了热情洋溢且又颇具指导性的讲话;省社科院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多方支持,尤其是对会议论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资助;周芳苓与王义飞两位同志参与了整理编辑工作。此外,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宋立道先生和责任编辑张一先生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可贵的支持。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史昭乐
2012年2月2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社会管理编

国外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对贵州的借鉴与启示 王国勇、刘 洋 /1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人为本 汪 勇 /9

社会体制的科学意涵及功能探讨 胡彬彬 /18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杜勇敏、徐 向 /26

从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思考 翟鲁平 /34

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注重的几个问题 马家瑜 /39

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原 方 /46

虚拟社会管理现状分析 张晴晴 /54

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对贵州的借鉴与启示 刘 洋、王国勇 /60

贵阳市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罗恩源、徐 向、苏明珠 /68

民间组织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 廖小东、曹文波 /76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唐正繁 /84

目
录

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村支书的角色定位研究 ——以贵州省罗甸县为例	杨方旭 /92
贵州新农村社区建设与创新的几点思考	周腊梅 /99
社会管理视角下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社会环境探析 ——基于贵州省的调查与分析	史昭乐、陈 讯 /107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探讨	廖慧贞 /115
违章建筑与农民行为 ——基于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分析	王晋佳、陈 畔、赵帅斌 /123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与“新医改”	汪惠惠 /131
校园安全问题的多维视角分析	刘 郁 /138
引入社工人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谈贵州社区矫正人才队伍的发展	李宏芳 /147

文化发展编

文化自觉、文化传统与社会学研究	李建军 /157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社会学解读	罗玉达 /165
孔子的论语文化与人生历程	温卓文 /173
试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 ——以贵州苗族为例	张 辉 许江红 /180
浅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的贵州红色文化旅游	李 琴 /190

贵州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析	陈芊羽	/196
试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孙艳杰	/202
贵州傩文化应对文化全球化可采取的对策	周松柏	/208
高校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研究 ——以贵州省高校为例	陆永胜	/215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企业本土化探讨 ——基于贵州“刘大姐”的个案分析	郑莹	/223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基于贵阳花溪区彝族农民工群体的调查	彭希义	/23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困境及对策 ——以遵义市为个案	周芳苓	/239
城市老年人再婚问题浅析 ——基于贵阳市问卷调查的报告	胡晓	/248
论乡风文明的几个基本层面	高刚	/256
浅谈贵州省大方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赵曼	/265

社会管理科学化与文化繁荣编

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与贵州文化繁荣发展	刘冬冬	/275
促进贵州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对策初探 ——基于社会科学管理的视角	马艳霞	/282
文化产业发展中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徐建宇	/289
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中谈民生	谢瑛	/297

马克思全面自由发展理论视阈下“幸福指数”体系的构建	陶达	/302
中国社会职业女性成长环境的几点思考	韩晓倩	/310
关于贵州省2011年度“职工书屋”建设的调研报告	俞南平、王彬	/317
少数民族村庄基督教与乡村政权关系研究 ——以黔东南四个苗族村寨为例	庄勇	/325
关于正确处理当前农村邪教组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欧阳恩良	/334
民间舆论交流的负面效应及对策思考	周冬梅	/337
贵州高校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探微	陈杜鹃	/346
贵州城乡民生事业发展差距现状的分析	李致江	/354
农村传统民居危房改造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王伯承	/362
我省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问题思考	张玉林	/369
城中村农民文化生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基于S省W市K区的调查	张磊、谭晓昌、吕燕平	/376
村落社区危机应对的传统文化习俗探析 ——对旧州一带“打清醮”的田野考察	吕燕平、朱发猛	/385
新形势下完善贵州省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调研与思考	丁胜	/394
附 提交论文总目录		/401

国外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对贵州的借鉴与启示

王国勇 刘 洋*

摘要 本文回顾并论述了西方国家各理论流派在社会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以及管理模式的历史及现状。以期对中国以及贵州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上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及做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理论综述 管理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深入,我国社会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整个社会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较于经济领域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界定不明、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现象较为突出,公民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已难以解决现有社会问题。

相较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管理已经成了明显的“短板”。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急迫性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省部级培训班以来,全社会兴起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创

* 王国勇(1963~),男,布依族,贵州长顺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学理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刘洋(1987~),男,汉族,湖北仙桃人,贵州民族学院200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新,各地纷纷结合本地实践,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为原则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力图实现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管理理论,研究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能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各种经验、模式及做法的成功案例,能够为我国社会管理理论与创新提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警示性教训,能够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充足的比较研究材料,有助于强化党的领导,有助于坚定改革信心,有助于营造良好氛围,有助于确保社会稳定,对加速推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

二战以后,国外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管理理论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的社会管理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社会管理理论。

(一)福利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

福利国家社会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只要政府实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通过对遗产和收入实行累进所得税、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等措施,就可以解决市场经济存在的许多缺陷,如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第二,一个国家只要致力于经济增长,使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并使国民有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福利待遇,就算得上是一个福利国家。第三,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扩大社会福利,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可以看出,福利国家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并重社会发展,同时认为经济发展先于社会发展,并强调二次分配有助于社会公平。我国经济发展明显优于社会发展,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福利国家社会管理理论重视公平、强调民生、扩大福利的做法有益于我国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管理理论

“第三条道路”关于福利的基本观点在于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种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也关注穷人。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管理理论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它与和谐社会理论都试图构建一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它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公平、就业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等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难题上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新公共管理”的社会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的社会管理理论强调市场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为政府减负,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放权。它认为在现代国家,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新公共管理”的社会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一个起催化作用的、社区拥有的、竞争性的、有使命的、讲究效果的、受顾客驱使的、有事业心的、有预见的、分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这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有较大的启示,例如社区建设中政府适应放权做裁判,而非保姆;要授权而非揽权;要财随事转,而非财随人转。

(四)治理与善治的社会管理理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

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最佳状态。

治理与善治的社会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地社会管理理论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状态,它追求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对现阶段我国“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互惠双赢、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目标有借鉴作用。

三、欧美国家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

(一) 美国的社会管理模式

美国政府社会管理特点有四:

第一,是通过比较合理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调节,为解决民众的生存、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从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

第二,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各种渠道支持慈善和志愿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在美国,慈善和志愿组织收入来自个人、基金会和法人捐赠的占其总收入的 20%,31% 来自政府基金或政府合同,49% 来自缴款、收费、投资收入和其他所得。美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根植于很深的战略伙伴关系。政府对慈善和志愿组织的直接支持表现为直接为他们提供基金支持和直接与慈善和志愿组织签署合同;直接为那些参与低收入阶层服务的慈善和志愿组织付费。政府对慈善和志愿组织的间接支持包括免税、减税;为从事儿童照顾、老人照顾、住宅补贴的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税收信用(政府为那些给这类服务付费的个人买单);税收减免国债保险。

第三,在许多其他国家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在美国却由非营利组织和私人提供。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特点是,正式组织的、独立于政府之外、非营利、自律、志愿性。根据美国法律,其非营利组织包括 150 多种类型,覆盖的领域非常广,美国还有 84800 个行业协会(business leagues)。美国人民相信,非营利组织可以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服务,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经营了大部分的社会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

(二) 德国的社会管理经验

在德国,由政府在基层社区设立的公民办公室遍布全境,这种基于电子政务平台的公民办公室,直接面向普通公民,是为公民日常生活提供政府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的基层单位;公民办公室“让数据而不是让公民跑路”的优点,确保了公民、企业、院校及其他机构能更方便、快捷和花钱最少又最有效地享受政府的各种服务,从而大大增加国民对政府及管理的满意程度,并提升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地位。

德国的经济很发达,但是在社会舞台上,主要有三大角色:政府、营利部门(企业公司)和非营利部门。其中非营利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就是社会中介组织。营利部门主要致力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主要致力于社会服务和管理,政府则在两者之间,站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政策调节、制定法律和财政支持,来实施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的普遍产生和蓬勃发展,使德国政府的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境界,政府的职能是宏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是具体的组织者和运作者,两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现在,德国的社会组织不仅广泛存在于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传统公共服务领域,而且更日趋活跃于环境保护、急难救助、社区重建、社会融合等新兴领域。

同美国一样,德国也是宗教大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众性民间组合是以宗教团体形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教会,教会真正掌握的重要资源是其看不见但却无法估量的社会资本。正是依靠巨大的社会资本,宗教得以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在社区频繁活动,影响无处不在,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形成了广泛而强大的宗教道德基础,特别是从宗教信仰中孕育出的民众诚信、向善和保持道德底线的思想,对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政府充分有效地利用宗教来管理社会,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三) 英国的社会管理做法

“大社会”管理模式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社区自我运作。地方政府把

社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免费为社区提供土地，由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当地发展规划，通过自行开发和出租给房产商两种形式建造房屋，并由居民自我管理社区，自我提供服务。英国政府培训了 5000 名社区组织者到基层，确保引导所有市民，发挥出“人民的力量”。市场化操作。成立以慈善为目的、公司化运作的资产公司。公司在社区的规划、建造和管理中承担具体业务，全部盈利用于社区各项服务。社区建设项目全部采用竞标形式，开发过程通过市场运作，公开透明，接受全体社区居民监督。成立社会银行。在积极鼓励私人投资的同时，激活社会不良资产，盘活死账呆账，包括那些滞留在银行账户（比如已去世的人）里多年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

“大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基层，英国政府拿出 10 亿英镑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型企业，承担政府裁减机构后存在的公共服务空缺，公共服务的提供渠道得到拓宽。同时政府通过授权和分解责任，对人员实行聘任制或合同制，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行政问题，政府相应承担的职能减少，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总之，英国的社会公共管理涉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产品的设置及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都是从人的需求和利益出发，民生被摆在了十分突出和重要的位置。

四、借鉴与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使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新形势、新特点面前，我们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社会管理的效能和